

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

——评《失去的机会》

毛 磊 李明强

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近几年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已引起史学界同行们的关注。

《失去的机会》一书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为背景，着力刻画、记述了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之际，团结御侮，一致抗日，争取国内和平，以实现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的历程。该书以国共两党为实现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进行的秘密的公开的谈判为主线，生动具体地再现了十年谈判的曲折经过，全面系统地剖析了不同阶段两党谈判的特点，特别是对国共两党力量消长对谈判双方态度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该书是一部史论结合，以论为主，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史料翔实，论证充分的学术专著，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以它特有的内涵让读者更深地体会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含义。此书以流畅洒脱的文笔，再现唇枪舌剑的精彩场面，令人耳目一新。

—

《失去的机会》一书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直接把国共两党的谈判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两党谈判过去也有人研究，但研究比较

零碎,主要集中于两头,即: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1936—1937年的谈判和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失去的机会》一书首次比较详实系统地探讨了十年间国共谈判的全过程。长期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注重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共关系,前期注重于政治、军事的合作,中后期则多讲摩擦与分裂的倾向,具体研究选题也多限于一时一事的横向探讨,如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而对于贯穿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国共谈判的纵向考察极少,这方面的专著也付之阙如。该书则直接以国共两党的谈判为题,从新的角度来考察国共两党关系,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在前言中曾明确表示:“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中最复杂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这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失去的机会》一书紧紧抓住国共两党关系中的谈判关系是很有眼光的。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作为两大政治集团,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再度合作,从1936到1946年间,国共两党的关系极为复杂,“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该书作者抛开表面密切的两党政治合作,更不描绘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而是独辟蹊径,着力于硝烟战场的幕后——国共谈判。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探究两党的谈判过程对了解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二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两党谈判的合分矛盾,论述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作者并没有因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对其大张挞伐,也没有因共产党的胜利而对之过于溢美,而是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根据,客观地论述两党谈判的全过程。

作者的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作者如实地论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提出及形成过程中两党的作用，客观地评述了国共谈判中的妥协和让步。该书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是中共首先提出的，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及随后中共代表团公开发表的宣言和文章都曾明确提出过；但两党真正接触则是国民党首先主动寻找共产党的。而过去学者论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时，并没有鲜明地提出国民党的主动态度。最初，中共虽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但这一方针开始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极力想“收编”中共军队，同时也把中共作为对苏交涉的筹码。双方的条件相距很大，两党关系仍很紧张。1936年一年的谈判，国共两党都感到对方谈判条件苛刻。谈判进行到1937年上半年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的权威，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国民党也打消了“收编”的念头，国共关系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这真实反映了国共谈判初期的状态。再如“为宣传和舆论而战”的1944年谈判：国民党对中共是要“加以制裁”的，“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应用政治方法解决”，而事实上，“蒋介石这时并不存在任何通过政治方法根本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幻想”；中共也不相信国民党政治解决具有诚意。因此作者指出，双方在没有任何可行性基础上的谈判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宣传战。谈判一轮又一轮，草案一个接一个，为了避免不利于己的结果，双方所提草案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如国民党提出：“四军十师以外之中共军队必须‘限期取消’，编后军队要‘限期集中使用’，中共不得发行钞票，陕甘宁以外之中共政权须交国民党接管处理。”如此苛刻的条件，中共当然不会接受。又如，中共提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对这种要求，国民党也是不会作出承诺的。至此国共两党谈判已经完全改变了性质，就是说谈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出于政

治宣传。作者依据历史事实，忠实地记述了这一过程。

其二，对美苏干预国共谈判，作者也给予中肯的评价。国民党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主要执行亲美政策。中共从产生那一刻起就和苏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美苏对国共两党有重大影响，其对华政策直接左右两党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从打败日本以及战后格局出发，介入国共谈判。该书准确分析了美苏对国共谈判的介入及国共两党的反应。如关于1944年的谈判，该书说：“随着1944年底美国开始公开介入国共两党冲突，美国总统的特使竟一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到一起来了，以致形成了一个带有美国式民主色彩的联合政府的解决方案。但是，与共产党所取得的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足以抵御来自与自己有着共同战略利益的国民党的施加的压力。于是，一度试图说服国民党的这位美国特使只能又摇身变成了蒋介石的说客。”国民党方面盛赞美国介入国共谈判；中共起初对美国持怀疑态度，并要求苏联同样介入，继而对美表示审慎的欢迎，在了解美方的目的是建立联合政府后转而积极配合。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中共中央此时相信：‘国共反映美苏。’共产党之同意与蒋谈判，并非决定于蒋介石，而是决定于美国。同样，蒋介石之希望与中共谈判，也并非取决于中共，而是蒋相信中共背后站着的是苏联。”作者对于美国想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初衷给以了公正的肯定。

三

该书史料运用得好。抗战前后十年间，国共两党秘密或公开的谈判很多，但还没有谁作过准确的统计，每次谈判参加人员有限，又没有双方认可的共同纪要或记录，因而研究此问题就很困难。另外，国共谈判距今年代虽然不远，但各种秘闻传说甚多，加之出入颇大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使历史真实与社会传闻杂糅混合。此外，尚有一些核心史料没有公布，也使这段历史显得迷雾重重。以上种

种，就给国共谈判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发掘、使用和辨析史料的更高要求。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函电、档案中，作者精心辨识，去伪存真，充分重视共产国际、苏联的指示，中共和国民党的来往函电及文件，美国方面的文献资料等，并把这四方面的史料互相印证，以弥补缺乏谈判纪录的不足。该书论述中共在谈判中的态度时，多采用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中央与谈判代表之间的函电为依据，辅以国民党代表向国民政府的报告为佐证，并引述双方代表的回忆录；论述国民党的态度时，多以台湾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为主，辅以有关的回忆录及蒋氏父子的著述等；论述美国方面的态度则以美国编的《美国对外关系》（中国卷）为准绳。作者把纷繁复杂的史料运用得恰到好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在史料运用方面，1940年的划界谈判很有特色。著者首先引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详细列举国民党的主张，紧接着引用周恩来关于陈蒋十条给毛泽东的报告，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并且把国共两党的方案都列举出来加以对比分析，双方的意图一目了然：国民党要最大程度地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共产党要尽最大可能地扩大地域，据此得出结论：“国共谈判，仍是拖延”。

又如：1946年关于东北的问题，国民党方面一直认为苏联把东北日军的所有武器转交中共，武装了大批的中共部队；大陆的著述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模模糊糊，所以使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问题上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著者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支持国民政府开始，逐层分析：苏联碍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支持中共，但也没有拒绝中共进入东北，从中共文件和苏联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有限地支持了中共。美国对华外交注重于战后格局，从美苏远东妥协这一根本点出发，美国一方面大力扶持国民党，另一方面也默认了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作者以美苏国共四方的史料证明了：在东北问题上苏联有限地支持了中共，但也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苏联无限支持中共占领东北。

四

该书一方面以史料扎实、立论严谨见长，另一方面又在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方面，作出了令人振奋的尝试。近年来，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一是受市场的冲击，学术著作读者少，经济效益低，很多出版社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著作本身来说文风呆板，缺乏可读性也是读者少的一个原因。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较强的可读性的著作生命力才可能长久，该书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文字干净流畅生动，表现力强，作者在材料的组织上精心构架，比较娴熟地使用了一些文学写作技巧，文风活泼而又不失史学的严肃性。注重章节的过渡，该书在每章之首都有一段承上启下的文字，提纲挈领地概括全章，提醒读者留心主题的进程，轻松自然而又饶有兴趣地进入新的章节和问题中。全书议论风生，善于辨析，其平易而精当的议论，既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也增加了可读性。

《失去的机会》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但它仍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如关于皖南事变后的国共谈判，书中一笔带过。事实上，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间的接触、谈判并没有中断，蒋介石多次邀中共代表谈话，力求缓和紧张局面。国民党为争取中共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也不遗余力。这段内容撇开不述，会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是统一战线处于破裂边缘时，国共两党却都不闻不问。事实恰恰相反，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都在努力修补行将破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如，该书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没有把每次“机会”这个内涵特别突出出来，就是说没有集中探讨“机会”产生的特点及失去的原因等。这显然与整个国共两党谈判史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关，但对该书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我们相信作者一定会在这本书扎实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